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张振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摘要] 本文简单梳理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特色。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传统与变迁部分回顾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机构与队伍部分介绍了 1978 年以来以东南亚研究所为主体的发展情况; 成果与特色部分介绍了东南亚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 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 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 D7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7)06-0013-05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Jinan University

Zhang Zhen jia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e paper.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Jinan University. Part two introduces the current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rom 1978. Part three briefly introduces its pub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tentatively summarizes its features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final part talks about it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future.

从 1927 年设立的海南文化事业部开始,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走过了 80 个春秋。尽管暨南大学几经停办与迁徙, 但东南亚研究始终与大学相生相伴。本文将从传统与变迁、现有机构与人员队伍、成果与特色以及问题与挑战四个方面简单介绍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尽管力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 但终究难脱一孔之见, 遗漏与偏差之处, 还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以望给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一个客观的定位与描述。

传统与变迁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 1906 年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 主要用于培训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子弟。正因为如此, 学校从创办之初就很重视对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等问题的教学与研究。1917 年暨南学堂改名为暨南学校, 第二年就正式创办了《中国与南洋》刊物, 旨在“使华侨明了

祖国事情, 及国人了解南洋状况, 并宣布祖国之华侨教育状况。”该刊物共出版了 3 卷 25 期, 可谓开启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1]。

1927 年暨南学校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当年就设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 郑洪年校长亲自兼任首期主任, 在南洋文化事业部的 6 项任务中, “以开展南洋研究为中心任务”。“其后迭经变革, 部内设施, 益臻完备”, 后更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1934 年再次扩展为海外事业文化部。在新任校长何炳松的大力支持下, 该部成为当时国内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中心。

海外文化事业部的工作共分为出版、研究和教育三大块。在出版方面, 事业部开始出版有《南洋情报》(半月刊), 之后又编印了学术期刊《南洋研究》(月刊), “其内容除介绍南洋美洲及各地华侨有关之消息, 并研讨一切华侨问题外, 复注重国内与侨胞有关之各种事业, 以做精密翔实之调查

* [收稿日期] 2007-11-09

[作者简介] 张振江, 博士,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 该文被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收录, 这里稍有修正, 特此说明。

与研究,俾使海外侨胞明了国内情势,并引起国人注意华侨在海外情形。”此外,事业部研究人员还筹办了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海外侨讯》(周刊)和厦门《江声日报》的副刊《中南周刊》。到1937年3月,《南洋研究》已经连续出版7年至7卷2期,《中南周刊》57期,《海外侨讯》70期。从1937年开始,他们还编纂了《南洋年鉴》。在学术研究方面,事业部研究人员主要通过“通讯调查”和少部分的“实地考察”等方式开展学术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南洋丛书”,到1937年“共有二十余种之多,其余尚有多种正继续付梓。”其中包括李长傅的《南洋各国史》刘士木的《荷属东印度之经济》顾因明的《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邱致中的《南洋概况》等。此外,事业部研究人员还为大学开设《南洋概况》等课程,并积极参与大学从1936年开始创办的“侨民教育师资培训班”的相关工作^[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中心,对国内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海外文化事业部的刘士木、姚楠等研究人员后来还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起了南洋学会,成为不同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的“中国观点”的源流之一^[3]。

由于暨南大学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国共内战中,暨南大学命运坎坷,几遭迁徙与停办,但东南亚研究始终与大学形影不离。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下的“港澳、东南亚经济研究组”的基础上,暨南大学成立了时至今日的东南亚研究所。到1966年暨南大学再遭停顿与撤销时,东南亚研究所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资料基础。由于政府的支持和海外热心人士的捐款,在短短的几年内研究所购入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大量中外文图书资料,“数量与种类之多,在当时中南各省同行中首屈一指。”第二,人才基础。很多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知识分子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相继进入研究所,“到1966年上半年,调集了各类人员42名,含9个语种。”第三,出版基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将原来由港澳、东南亚经济研究组出版的《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季刊)改为《东南亚研究资料》,出版杂志成为研究所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自建所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该刊按时出版,前后共30期,发表文章443篇(其中译文385篇),

计570万字。第四,研究机构建设基础。当时研究所下设了四个研究组,分别为印支组、泰缅组、海岛组(含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和经济组。此外,还设有资料室和编译室。第五,学术沟通基础。“当时虽受关门研究路线限制,但仍同国内外同行建立了联系。”^[4]

机构与队伍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东南亚研究所随之恢复,并一度由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校长杨康华兼任所长。“复员时期的研究所,集合已七零八落的旧所员,调入一批专业与东南亚有关的老同志,索回当时大部分的图书资料,复刊《东南亚研究资料》重组班子与架构。”^[5]至此,像暨南大学一样,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终于走上了一条连续发展的道路。

经过近30年的持续发展,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研究所和华侨华人研究所两个单位。东南亚研究所现已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学术研究机构,是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会员单位,其研究重点在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以及华侨华人问题。近年来,随着教学的需要以及学术研究内在理路的发展,东南亚研究所在人才引进以及研究领域等方面注意扩展到国际关系研究,2003年设立了美国研究中心,集中研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研究所现设有亚太经济与政治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文化研究室、外交与侨务研究室、美国研究中心、情报资料室和《东南亚研究》杂志社。目前全所(系)在职专职教研人员20人,其中3人具有正高职称,11人具有副高职称,大多具有博士学位。此外,该所还聘有遍布海内外的兼职研究人员50多名。

如前所述,华侨华人研究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960年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就是华侨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暨南大学于1981年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华侨华人研究所。该所以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为主体,将华侨华人研究扩展到世界各地,逐步产生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2000年,华侨华人研究所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该所现有11名专职研究人员,其中3名教授、5名副教授,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为了进一步凝练和突出华侨华人的研究特色与优势,2006年,暨南

大学又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以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大投资,推出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

1998年,以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为特色和基础,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为华南地区第一家(时至今日仍然是)拥有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2002年,在东南亚研究所的基础上,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成立,并于当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国际关系学系和东南亚研究所实行系所合一、科研教学两位一体的新管理体制。时至今日,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学系)已经发展成拥有一个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三个硕士点和一个国际关系博士点的三级人才培养机构。2002年,国际关系学科被授予以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2007年,又被广东省教育厅批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

成果与特色

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科研人员共主持了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0多项国家部委和省级以上的各类科研项目。由曹云华和陈乔之分别主编的“东盟研究丛书”和“华南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已经出版8本。过去5年中,研究所人员公开发表学术文章500多篇,出版专著近30本,内容涉及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等不同内容。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国际政治论文数据,在2001—2005年发表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前42位作者中,暨南大学有4位科研人员入选,其中曹云华还入选同期国际政治学论著引用40次以上的学者队伍^[6]。同期全国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被引用30次以上的研究机构中,暨南大学位居第11;同期发表国际政治论文6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中,暨南大学仅次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排名第4^[7]。

在此仅列举一些代表性的研究专著:在东南亚国别方面,代表性专著有《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曹云华)、《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陈乔之、曹云华)、《菲律宾》(高伟浓)、《世纪之交的马来西亚》(廖小健)、《印尼经济与社会》(温北炎)、《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温北炎、郑一省)等;关于东南亚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东南亚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曹云华)、《冷战后东盟对华政策研究》(陈乔之)、《变更千年如走马

——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眼中的“黄金半岛”》(高伟浓);关于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曹云华)、《中缅友好关系研究》(林锡星)、《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高伟浓)、《新中国—东盟关系论》(曹云华、唐翀)、《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对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王子昌、郭又新)、《探究亚太新秩序》(曹云华);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要研究专著有《东南亚华侨史》(朱杰勤)、《战后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广州华侨研究会)、《菲律宾华侨史》(黄滋生)、《印尼华侨史》(黄昆章)、《新马华侨史》(张应龙等)、《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石沧金)、《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曹云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薛君度、曹云华)、《下南洋》(高伟浓)、《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高伟浓)、《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综述》(周聿娥)、《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廖小健)等。

结合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机构与人员发展,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变化与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关系逐步成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一个突出内容。上世纪80—90年代,其主要研究领域比较集中在东南亚的经济方面。之后,主要由于东南亚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以及形势的发展,研究领域逐步从经济、华侨华人问题扩展到国际关系,而研究范围也开始从东南亚向东亚和亚太地区发展。根据《东南亚研究》2000—2005年的载文统计,东南亚地区国别的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容,占到整个东南亚论文的四分之一(见表1)。如果与同一时期厦门大学《南洋问题研究》的载文(见表2)相比较,两家机构的研究主题有着明显的不同侧重点。

虽然国际关系已经成为新的领域,但华侨华人研究仍然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的传统与特色,尽管后来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走出东南亚遍及世界,但一方面由于主要的海外华侨华人口仍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研究的传统和基础,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研究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如此,这里还为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再从《东南亚研究》2000—2005年的载文来看,东南亚华侨华人类的研究论文占到整个东南亚研究论文的19%,仅次于国际关系,占居第二位(见表1)^[8]。

表 1 《东南亚研究》2000—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

对外关系	华侨华人	政治	社会	经济	地区合作	历史	安全	宗教	合计
91	68	64	39	25	22	19	17	14	359
25%	19%	18%	11%	7%	6%	5%	5%	4%	

表 2 《南洋问题研究》2000—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

经济	华侨华人	对外关系	历史	政治	社会	地区合作	宗教	安全	合计
92	38	33	28	12	9	6	5	4	227
40%	17%	15%	12%	5%	4%	3%	2%	2%	

与研究内容相关,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新的拓展。由于研究条件的改善、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年轻人员的加入,“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及其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立体的、综合的分析。……引起了研究方法方面的一场革命,使广东乃至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产生了质的飞跃。”^[9]例如,曹云华在撰写《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时,多次前往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到各国的华人社区进行访问和调查,经过6年的积累与准备,才最终完成这部33万字的著作,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再如王子昌与郭又新合著的《地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建构主义理论对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行了分析,重新审视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问题,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新突破。

第二,《东南亚研究》成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平台

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东南亚研究》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阵地与平台。《东南亚研究》是在1960年《东南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7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1992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至今已出版170期,每期18万字。该刊现为国际政治类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即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表 3 《东南亚研究》2000—2005年载文内容分类(国别)

东南亚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缅甸	菲律宾	文莱	柬埔寨	老挝	东帝汶	总计
134	57	35	27	29	26	25	19	6	5	2	1	366
37%	16%	10%	8%	8%	7%	7%	5%	2%	1%	0.6%	0.3%	

* 因为有几篇文章同时涉及两个东南亚国家,所以这里的统计总数超过了359的总篇数。

笔者曾专门对《东南亚研究》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研究》以及中山大学的《亚太评论》(中山大学《亚太评论》的前身是《东南亚学刊》)三份杂志进行过局部比较。这三份杂志都是由高校主办、公开发行并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刊物,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三份期刊2000—2005年的载文对比分析,发现只有《东南亚研究》涉及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11个国家,其中印尼最多,占其整个篇幅的16%,其次为马来西亚,占10%,接下来是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见表3)。此外,《东南亚研究》作者群的分布也最为广泛,包括广东、北京、福建、江苏、云南、河南、上海、天津、广西、山西、湖南、湖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上涵盖了国内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海外作者占到作者总数的6%,包括泰国、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等地^[10]。

这种对比分析,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东南亚研究》已经成为国内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最重要平台,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东南亚研究》在“传播东南亚研究成果、启迪青年学者、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东南亚研究》不仅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内容详实的研究材料以遴选备用,也为他们了解并借鉴先行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敞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当今中国东南亚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几乎都曾经在《东南亚研究》发表过文章,有些甚至发表过多篇文章,一些著名的中青年学者还长期被《东南亚研究》杂志社聘请为特约作者。”^[11]

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国际政治论文数据,在全国2001—2005年国际政治论文分布最多的前50种期刊中,《东南亚研究》排名第9,在2000—2004年国际政治学论文被引用最多的前60种期刊中,《东南亚研究》排第24,如果排除其中诸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等国际权威期刊,《东南亚研究》排第14^[12]。

第三, 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以东南亚研究为基础, 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如前所述, 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合二为一, 目前拥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教学梯队。自1994年至今, 已经有11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从这里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人数超过300人, 30余人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

由于地理位置和研究特色的影响, 本学科点的学生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现今的学生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以及中国香港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 作为华南地区高校唯一的国际关系博士点,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立足华南、辐射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人才培养中心。

正是源于教学的发展和需要, 促使国际关系成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重点。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学生论文选题也开始向东南亚方向集中, 这将势必有助于未来东南亚研究人才的成长。

第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广州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 从一开始就坚持“开门办所”的方针, “坚持以现状研究为主, ……直接为经济建设和侨务工作服务。”^[13]这种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研究人员结合现实需要, 注重应用与对策研究, 积极从事东南亚的现状与热点研究。如研究所近年来承担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东南亚华侨华人等研究课题。这些问题多受政府和企业的关注, 既能加强和深化对东南亚的学理认识, 拓展研究范围, 提高研究水平, 同时又能服务于社会需求, 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 研究所主动与各级政府部门展开合作, 鼓励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和承担相关部门的招标课题与联合调研活动, 并为之提供决策咨询。长期以来, 研究所每年坚持有多篇研究报告送交各级政府部门, 其中很多都得到了国务院侨办以及广东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好评。如在2004年6月, 张振

江副研究员和陈建荣讲师应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外办组织的东盟考察团, 他们的考察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的亲笔批示与肯定; 2006年春, 张德江书记前往东南亚和大洋洲考察, 我所再次受邀写出了数万字的背景报告, 为此次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2006年, 曹云华和温北炎分别获得了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优秀奖和三等奖。

问题与挑战

暨南大学的国际政治研究, 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人员与机构的认可。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国际政治论文数据的研究, 一位学者提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院校, 研究力量较强, 发文也较多。值得关注的是, 暨南大学后来者居上, 在地区研究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14]尽管如此,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也面临着类似于整个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问题与挑战^[15],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尽管近年来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相比快速进步的其他学科, 作为一向不受重视的区域研究, 特别是相对于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严格指导下的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 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研究领域、问题、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亟待改进与提高^[16]。

第二, 东南亚研究队伍的变化。伴随老一辈东南亚研究者的相继淡出, 多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开始加盟东南亚研究队伍。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方法论训练以及英语语言优势, 但他们同时欠缺当地语言能力和对东南亚的切身经历, 而且不少人还存在着对东南亚研究的学科认同等问题。加之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背景, 人员结构的变化将成为决定东南亚研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 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由于中国高校的变化, 存在于高校中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教学压力。尽管教学与研究可以相长, 但近年来的教学压力已经实质性地妨碍了从事东南亚研究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把握这两者间的关系, 也将是东南亚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

【注 释】

[1] 马兴中:《开风气之先、走创新之路: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5/6期。

[2] 《国立暨南大学创校三十一周年、完成大学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第48-50页。(下转第25页)